



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初步研究



刘 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对猪驯化的开始和饲养的发展,逐渐出现有关猪形象的装饰或器物。不少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泥塑或陶塑的猪,如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距今 7300~7100 年的地层中便出土有泥塑猪^①,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 7000~6500 年的地层中出土有陶猪^②,北京上宅遗址距今 7000~5000 年的地层中发现有陶猪头^③等。此外,在山东章丘市西河遗址^④、湖北随州金鸡岭^⑤、肖家屋脊^⑥、邓家湾^⑦、山东王因^⑧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泥塑猪或陶猪。到了汉代,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迅速,在史前已成为重要肉食来源的猪,在此时的家畜饲养中仍然占有很大比例。同时,由于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陶猪成为墓葬随葬模型明器中的重要种类,在汉代墓葬中极为常见。尤其从东汉时期开始,大量出现于各类墓葬之中。

两汉时期,陕西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作为西汉首都和东汉西都的长安,其周边聚居大量人口。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既有高规格、高等级的帝王陵寝,也有众多的中小型墓葬。经考古发掘,这些墓葬中往往伴有陶塑动物的出土,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禽家畜,如陶猪、陶狗、陶羊、陶鸡等;二是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如陶鸟、陶虎、陶鹿等;三是想象出来的神兽,如陶龙、凤鸟等。而在这些陶塑动物中,陶猪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本文旨在介绍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发现概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期,进而探讨分布特点及其他相关问题。

一、陶猪发现概况

考古资料显示,随葬陶猪的墓葬多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华县等

地,另外在勉县、南郑、旬阳以及韩城、甘泉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据统计,122 座墓葬共计出土 560 余件陶猪(见附表一)。

二、陶猪的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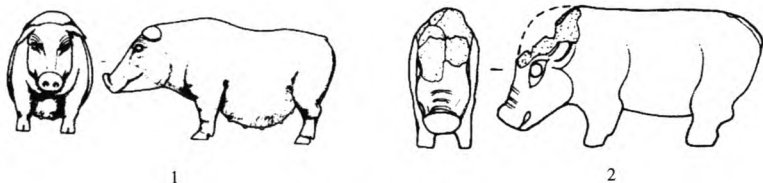
根据姿态,可将陶猪分为站立与伏卧两型。

A 型 猪为站立状。这类陶猪数量最多,共计 519 件。根据它们背部鬃毛的有无,可分为两个亚型。

Aa 型 颈部无鬃毛。共 434 件。此型陶猪出土于西汉时期的墓葬。如汉阳陵丛葬坑 K21 中出土的陶猪(图一,1)^⑨,陕西西安机砖厂西汉墓葬中出土的两件陶猪^⑩,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 M7、M77 等墓葬中出土的陶猪颈部均无鬃毛(图一,2)^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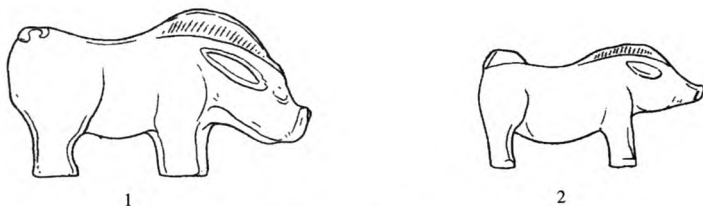
Ab 型 颈部鬃毛竖立。共 85 件。此型陶猪多出土于东汉时期墓葬。如西安东郊常家湾 M1:24(图二,1)^⑫,西安石油学院 M7:59(图二,2)^⑬,西安昆仑厂汉墓^⑭,南里王村 M5^⑮等。

B 型 伏卧状,这类造型的陶猪共发现有 5 件。



图一 Aa 型陶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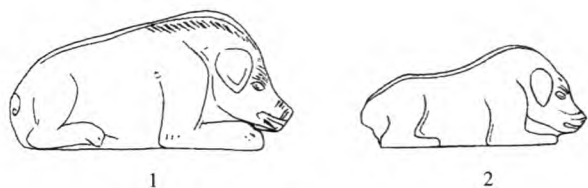
1. 汉景帝和陵南区丛葬坑 K21:67 2. 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 M7:7



图二 Ab 型陶猪

1. 西安东郊常家湾 M1:24 陶猪 2. 西安石油学院 M7:59 陶猪

凤翔西白村 M2^⑥中出土的陶猪后肢蜷卧,前腿前伸。纸坊乡铁丰村汉墓中出土一件母猪陶俑,呈卧状,形象极为生动^⑦。咸阳二〇二所 M6^⑧中出土一件跪卧状陶猪。西安旭景名园 M1:13(图三,1)、雁塔南路 M22:25(图三,2)出土的陶猪四肢屈曲伏地,头置于前腿之间^⑨。



图三 B型陶猪

1. 西安市旭景名园 M1:16 2. 西安雁塔南路 M22:25

另外,由于一些资料中陶猪数量或形制描述不详,至少有 40 件陶猪无法进行分类。

三、陶猪的分期

Aa 型流行于西汉早中期,出土于两类墓葬中:一是帝王贵族墓,如汉惠帝安陵陪葬墓^⑩中出土的二十三件陶猪及汉景帝阳陵丛葬坑中出土的四百余件彩绘陶猪^⑪,形体大,多数能分辨出性别;二是出土于中型土洞墓中,形体较小,泥质灰陶,从形态很难分辨性别,无彩绘,二范合成明显,制作较为粗糙。如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 M138 中出土的一件陶猪,圆目,小耳,张嘴藏尾,形体较窄,四肢短小,为合模制成^⑫。

Ab 型与 B 型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这一阶段,陶猪多为 Ab 型,如陕西勉县老道寺 M1 中出土的陶猪,形象为长嘴,厚唇,垂耳,长鬃,鼓腹,卷尾,臀部略弧^⑬;也有少量 B 型,如咸阳二〇二所 M6 中出土的陶猪^⑭,造型为跪卧状。

根据各类陶猪流行的年代,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约为西汉早中期。陶猪形象都为 Aa 型无鬃毛个体,不见 Ab 型与 B 型,多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中。这一阶段陶猪体形大,有的长达 44 厘米,外表多彩绘,各部位十分生动逼真。虽然该期出土陶猪的墓葬数量并不多,但由于帝陵丛葬坑和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出土大量陶猪,从而导致墓葬数量少而陶猪数量极多。

第二期,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这一阶段陶猪类型明显增多,以 Ab 型有鬃陶猪为主,同时存在零星 Aa 型无鬃陶猪以及 B 型伏卧状猪。该期

陶猪有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两种,有的外表施黄釉或绿釉,尺寸约为 12~24 厘米,制作较为粗糙。目前已有资料显示,这段时期陶猪均出土于中小型墓,且每座墓仅随葬一至两件陶猪。

四、讨论

(一) 陶猪制作的变化

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制作变化大体有两点:

首先,从西汉早期制作精细发展到东汉时期制作模式化、简单化。

帝陵与高级贵族陪葬坑或墓葬中出土的陶猪做工精细,尾巴为木质,并塑造出乳猪、成年公猪、母猪的生理特点,如汉景帝阳陵东侧外藏坑中出土的陶猪,母猪腹下有两排小乳头。肛门之下有阴器,公猪腹下两后肢之间有较长的阳具,颜色有黑白两种,四蹄饰粉红色彩绘^⑮。它们造型生动形象,制作工艺远高于其他中小型墓中出土的陶猪。相关考古资料表明,西汉时期长安城西市遗址中发现烧造陶俑的官窑遗址^⑯,出土的残陶俑与西汉帝陵或一些高等级贵族的陪葬坑或墓葬中的陶俑相似。而这些随葬帝陵或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陶猪,很可能也是在官窑内烧造而成。

中小型墓葬中的陶猪普遍合模制成,也有少量捏制,多为泥质红陶或灰陶,无彩绘,西汉晚期有的陶猪表面会施青黄色釉,形象没有高等级贵族墓葬或丛葬坑内出土的精致细腻,有的甚至比较粗糙。这一阶段的陶猪不仅没有西汉早中期那样写实形象,而且个体较小,绝大多数造型相似。如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⑰中出土的一件陶猪造型比较简单:长嘴,垂耳,长鬃,卷尾。这可能是由于帝王贵族的陪葬明器由专门的官窑烧造,要求较高;中小型墓葬的随葬明器是民间制作,造型简单,成本低廉,符合广大中下层的需求。

其次,西汉早中期陶猪脊背上无鬃毛,而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陶猪多有鬃毛。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尚无明确结论,但陶猪局部造型的变化,与当时饲养的活猪品种、手工匠人乃至社会审美、风俗习惯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关联性。随着今后陶猪相关资料的逐步积累,结合汉代猪骨的研究,这一问题可能会有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 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出土特点及原因

资料显示,随葬陶猪的墓葬形制包括三种:一是西汉帝陵丛葬坑,二是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三

为带长斜坡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或砖室墓。据统计,出土有陶猪的122座墓葬(或从葬坑)中,丛葬坑占2座,土洞墓占41座,砖室墓占73座,另有2座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以及3座形制不明的墓。砖室墓的比重最大,约为60%;土洞墓的比例约为34%;丛葬坑、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以及形制不明的墓共占约6%。

西汉帝陵为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陶猪的随葬位置一般位于帝陵封土四周的长条形丛葬坑中,可能代表着厨厨之属。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以陕西新安机砖厂西汉墓为代表,该墓积沙积炭,墓内出土着衣俑、骑马武士俑等有鲜明等级性质的随葬品,并且出土篆刻“利成家丞”的封泥以及肩部写有“东园□□”四字的陶罐,从而确定了该墓的墓主属于列侯等级^⑨。这类丛葬坑与墓葬的时代多为西汉早中期,出土陶猪为无鬃毛站立状。带墓道的土洞墓以及砖室墓一般为单室或多室,随葬品较为丰富。如陕西扶风纸白西汉墓,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内出土众多彩绘人物俑,其服饰、体态及彩绘风格与景帝阳陵丛葬坑出土的几乎一致,仅仅在形体高度上为后者的三分之一^⑩。砖室墓出现于西汉中后期的中原和关中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到东汉已流行全国。贵族和大官僚的墓,规模宏大,除后部主室外,多设前室、中室或侧室,在布局上模仿他们的府第。但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墓葬,尤其是从西汉晚期以后,多为中小型砖室墓,推测这部分墓主属于中下层。这类墓葬多出土有鬃站立类型的陶猪以及少量伏卧状陶猪。

从墓葬年代与墓葬形制来看,在西汉前期,大量的陶猪随葬于帝王陵墓的丛葬坑以及高等级贵族的墓葬中,墓主为王公贵族;从西汉晚期以后,随葬陶猪的墓葬激增,多集中出土于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中,这类墓主人身份可能多为低级官僚地主等中下层。

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出土陶猪的墓葬由少变多,由高等级王公贵族墓葬发展至广大中下层的墓葬中。这与丧葬观念由上而下的传播普及和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是东汉时期庄园经济的兴盛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使得在这一阶段出土陶猪的墓葬数量增加。

(三) 陕西地区汉代陶猪分布特点及原因

陕西出土的汉代陶猪地点集中分布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以西安、咸阳、高陵为中心,西至宝鸡,



图四 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分布图

东到华县、潼关;陕南地区分布较少,以勉县、南郑、旬阳为代表;北部仅有韩城市 and 甘泉县。

根据陕西地区出土汉代陶猪的分布图(图四),出土陶猪的汉代墓葬分布具有不平衡性,陕西中部最多,其次为陕南地区,陕北最少,仅发现一例。

这可能与各地区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地位、经济状况、文化习俗有关。关中地区气候适宜、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天然水系丰富,是传统农耕区。到了汉代,这里人口密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与众多水利设施的修建,使得农业有了较大的进步。农业的进步带动家畜饲养的发展,在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日趋生活化、世俗化的影响下,陶猪成为该地区流行的随葬陶俑。陕南地区水热条件优越,同属于传统的农耕区域,但出土陶猪的数量不多;这可能与该地区所发掘汉墓的数量不多有关。而陕北地区纬度偏高,较为干旱,人口较关中少,是长城沿线游牧与农耕混合区域,农业发展相对内地较为落后,并且这一地区的文化习俗受到关中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双重影响,是两种文化的交错带。丧葬观念与关中地区可能并不完全相同,随葬陶猪的墓葬极其少见。尤其是陕北北部接近匈奴的控制范围,该区域存在靖边老坟梁汉墓^⑪,大保当第11号、23号汉画像石墓^⑫等一定数量的汉代画像石墓,其随葬品中并未发现陶猪。而神木大保当墓地^⑬中墓葬的随葬品风格甚至带有匈奴文化的特点。从已发表资料看,陕北地区仅在甘泉县的一座土洞墓内发现一件釉陶猪^⑭。甘泉县

的地理位置处于陕北的南部,该地区发现的汉墓中随葬品基本与关中地区相同,说明该地丧葬观念可能更多受到关中地区的影响。另外,能够在生前消费大量肉食资源,并且死后要将肉食资源带入地下的阶层为王公贵族以及中、上层的地主,而这些人大多居住在关中平原一线,死后埋葬的地点也在这一带,这也成为影响陶猪分布的原因之一。

(四) 从出土陶猪看陕西地区猪的饲养方式

陕西地区的一些陶猪,有的与陶猪圈共出,有的甚至立于圈内,说明当时猪的饲养存在圈养的模式。陶猪圈可分为圆形与方形两类。圆形猪圈有: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 M1、M2、M6 各出土一件半圆形绿釉猪圈^⑧;韩城市一座东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陶猪圈呈圆形盆状,圈内站立一猪^⑨。方形猪圈包括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 M4、M7 中各出土一件圈厕合一的猪圈,猪圈中各立一猪^⑩。旬阳显神庙下坪汉墓中出土一方形猪圈,圈厕合一,厕位于圈的右后角,台式,有一椭圆形空洞与猪圈相通,一灰陶猪立于圈内^⑪。西安国棉五厂汉墓出土的一件方形猪圈厕所模型,内有厕所、猪圈,圈内无猪。厕所和猪圈分别位于院内左上角及右上角。猪圈呈方形,由喂猪台、进食口、食槽、棚屋等几部分组成^⑫。其中除潼关吊桥杨氏墓群中出土的陶猪圈无详细描述及图片资料,无法判断其具体形制外,韩城出土的圆猪圈内无厕所,旬阳显神庙下坪汉墓出土的方形猪圈从图片看厕所建于猪圈之上,而西安国棉五厂出土的猪圈中厕所则建于圈内。这似乎也可看出圈养样式的多样性。

另外,《后汉书·逸民列传第七十三》中载“梁鸿……少孤,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学毕,牧豕上林苑”^⑬。说明东汉时期关中地区同时还存在放养家猪的方式。

总的来说,汉代陕西地区兼备圈养与放牧两种饲养猪的方式,并且这两种饲养方式很有可能交叉并行,如白日在外放牧,夜晚再将猪赶入圈内。

五、结语

本文对陕西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猪进行分类及分期,认为陕西地区出土的汉代陶猪主要分为站立与伏卧两大类型。站立类型的陶猪又可分为无鬃和有鬃两种。依据类型的变化,可将这些陶猪分为两期,第一期约为西汉早中期,陶猪均为站立无鬃类型,出土于帝王陵墓陪葬坑及高等级贵族墓内;第二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陶猪多数为站

立有鬃类型,并存在少量伏卧类型。从出土陶猪的墓葬分布来看,大都集中于关中及其东、西部地区,部分分布于陕南地区,陕北地区仅见一例。结合时空分布,陶猪随葬的习俗最初发生于西汉早期帝王贵族高等级墓内,随后推广至中下层的墓中。结合实物与文献记载,可知汉代陕西地区饲养猪的方式包括放养和圈养两种形式。

通过对陕西地区汉代陶猪的初步研究,我们在养猪业、农业、陶塑动物俑的制作工艺以及丧葬习俗等问题上有所认识。随着今后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这些认识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必将有助于我们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对整个汉代的养猪业进行全面地探讨。

致谢: 本文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老师以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老师、刘瑞俊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 ③ 宋大川:《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 1949~2009 上》,科学出版社,2009年。
-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1997 年的发掘》,《考古》2000 年第 10 期。
-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 年。
-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 年。
- 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 年。
-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年。
- 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丛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 年第 6 期。
- ⑩、⑪ 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4 期。
- ⑫、⑬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三秦出版社,2008 年。
- ⑭、⑮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 年。
- ⑯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2 期。
- ⑰ 负安志,马志军:《长安县南里王村汉墓发掘简报》,

(下转第 64 页)

衡编著,《天马—曲村(1980~1989)》第三册,科学出版社,2001年。**b.**贾尧:《侯马厉祈遗址新月小区祭祀遗存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④⑤、④⑦、④⑧、⑤①、⑥③、⑥⑤、⑦①、⑦③ 赵昊:《东周祭祀遗存研究》,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④⑥ 罗运兵、杨梦菲、袁靖:《郑国祭祀遗址动物骨骼研究报告》,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④⑨ 贾尧:《侯马厉祈遗址新月小区祭祀遗存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⑤② Yuan Jing and Rowan Flad, 2005, 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4 (2005)252-270.

⑤⑤ 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试论偃师商城小城的几个问题》,《考古》1999年第2期。

⑤⑥ Yuan Jing and Rowan Flad, 2005, 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4 (2005)252-270.

⑤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官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

⑤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⑤⑨ Yuan Jing and Rowan Flad, 2005, 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4 (2005)252-270.

⑥① 马建梅:《周代中原地区祭祀遗址初步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② **a.**马建梅:《周代中原地区祭祀遗址初步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b.**赵昊:《东周祭祀遗存研究》,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⑥④ 马建梅:《周代中原地区祭祀遗址初步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⑤、⑥⑦ 贾尧:《侯马厉祈遗址新月小区祭祀遗存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⑥⑧ 黄蕴平:《天马—曲村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邹衡编著,《天马—曲村(1980~1989)》(第三册),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⑥⑨ 袁靖:《郑国祭祀遗址马骨鉴定报告》,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⑦① **a.**曹建敦:《周代祭品观念》,《天中学刊》,2008年12月第6期。**b.**曹建敦:《周代祭祀用牲礼制考略》,《文博》2008年第3期。

⑦② **a.**马建梅:《周代中原地区祭祀遗址初步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b.**曹建敦:《周代祭品观念》,《天中学刊》2008年第6期。

(上接第81页)

《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①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西白村秦汉墓葬发掘简报》,《文博》2010年第4期。

①⑦ 赵丛苍:《八座汉墓出土文物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

①⑧、②④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二〇二所西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②① 咸阳市考古研究所:《汉安陵的勘察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绘陶俑》,《考古》1981年第5期。

②②、②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②③、②⑦ 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第5期。

②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②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扶风纸白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

③①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0期。

③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③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③③ 王勇刚,王沛,李延莉:《陕西甘泉出土的汉代复色釉陶器》,《文物》2010年第5期。

③④、③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1期。

③⑤ 崔景贤:《韩城市东汉墓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第4期。

③⑦ 陕西省旬阳县文物管理所,旬阳县博物馆:《旬阳县显神庙下坪东汉墓清理简报》,《文博》2012年第1期。

③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③⑨ 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华书局,2008年。